第 38 卷 第 4 期　　财经研究　　Vol. 38 No. 4
2012 年 4 月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pr. 2012

FDI、劳动异质性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

王舒鸿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不同技能劳动的划分一直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研究视角，也是难点之一。文章创新性地采用模糊聚类方法测算了我国第二产业中各行业的劳动高技能性，推算了高低劳动技能行业的工资比率，并进一步实证分析了高低劳动技能行业的工资比率、FDI 等因素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由于高技能劳动一般与资本结合得更为紧密，高低劳动技能行业工资比率的提高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2)FDI 引入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也具有负向影响。

关键词：劳动异质性；外商直接投资；劳动收入份额；模糊 C 均值聚类

中图分类号：F015；F2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2)04-0059-10

一、研究回顾与对不同技能劳动划分的再思考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国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二，进出口总量排名第一。而与此同时，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却十分缓慢，其增长率比国民生产总值平均低 2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则更低。这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情况显著不同，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在 55％－65％的水平（Gollin，2002），而且与我国参与全球分工的背景相违背。根据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应使收入向劳动者倾斜。Acemoglu（2000）的研究表明在考虑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劳动收入份额只与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有关，而与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无关，所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Kaldor（1961）分析指出劳动收入份额应该为一个恒定不变的常数，这个结论是宏观经济增长的特征之一，被称为“卡尔多特征事实”。而近几年的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份额并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常数，很多研究文献都发现其呈现下降趋势。以中国为例，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在 2001 年之前处在 50％左右的水平上，而在 2001 年加入 WTO 后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这与卡尔多特征事实不相

收稿日期：2011-11-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2JJD790048）

作者简介：王舒鸿（1986－），男，山东青岛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符。有人提出应以库兹涅茨(Kuznets)曲线来解释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情况,在凯恩斯框架下,劳动收入份额呈倒"U"型变化,即先上升后下降,这个规律之后被称为"库兹涅茨特征事实"。但无论是卡尔多特征事实还是库兹涅茨特征事实,均无法解释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

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一方面将直接导致消费不足,使经济发展缺乏动力,从而制约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Kuijis,2006;Economists,2007);另一方面扩大了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对社会和政治稳定构成威胁(Subramanian,2008)。因此,有必要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进行分析。如果 Acemoglu(2000)的分析准确的话,那么劳动密集型出口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面临破产的窘境。我国是一个劳动力大国,短时间内从劳动密集型出口国转换为资本密集型出口国将是不切实际的,也不利于就业和社会稳定。根据微观经济理论,资本必须与劳动力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只有资本而没有劳动力是无法生产产品的。那么能否发挥我国的劳动力优势,以减缓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甚至促进其上升呢?

无论是新古典框架还是凯恩斯框架,关于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已有研究通常着眼于劳动供给与需求的变化,而忽视了不同类型劳动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重要性。尤其在新古典主义框架下,劳动被假定为只能生产一种产品的简单劳动,而没有考虑现实中生产不同种类、不同技术含量产品的多样化劳动。劳动异质性通常反映在不同劳动与资本结合时生产和技术效率的差异性上。现有理论的发展尤其强调劳动异质性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已有大量实证研究发现,发达国家高技能劳动越多,劳动收入份额越高;而发展中国家高技能劳动越多,劳动收入份额则越低(Diwan,2000)。之后的研究从多个方面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进行了解释。从投入要素和技术进步角度,Harrison(2002)对 1960－1997 年 100 多个国家、Bentolila 和 Saint-Paul(2003)对 1972－1993 年 OECD 国家、Guscina(2006)对 1960－2000 年 18 个工业化国家的研究等均表明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从经济全球化角度,Lee 和 Harrison(2002)、Jaumotte 和 Tytell(2007)、罗长远和张军(2009)、邵敏和黄玖立(2010)等的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对外开放还是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收入份额均有负向影响,即全球化带来的是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从政府因素角度,Bentolila 和 Saint-Paul(2003)考察了劳工斗争次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Jayadev(2007)分析认为财政赤字能够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而且政府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越大,国民收入越高。这也引发了学者对不同类型企业的思考,如周明海等(2010)将企业分为国有、民营和外资三种类型,考察了企业的异质性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确保了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而其改制为民营企业则提高了生产效率,却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上述研究文献对劳动的不同类型进行了区分,给本文的分析提供了新的

思路。劳动可以分为高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那么是否高技能劳动占比越大,劳动收入份额就越高呢?如果真的如此,那么我国可以发挥劳动力优势,将尽可能多的低技能劳动转化为高技能劳动,从而有效减缓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虽然 Diwan(2000)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高技能劳动越多,劳动收入份额越低,但他只对 2000 年之前的数据进行了分析,2001 年中国加入了 WTO,这一结论是否因全球化进程而有所改变呢?因此,有必要对中国重新进行分析,以更加准确地探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已有研究从多个方面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进行了解释和探讨,但没有考虑到劳动异质性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虽然 Bentolila 和 Saint-Paul(2003)对劳动异质性进行了理论分析,但缺乏现实的经验总结。此外,不同类型的劳动还存在区分上的困难,即以何种指标来定义高技能劳动或低技能劳动。而且根据 Krusell(2000)的理论假定,高技能劳动只有与资本进行有效结合才能产生最大功效,高技能工人对低技能工人还起到监督和管理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未必所有的高技能劳动都与资本进行了有效结合,这进一步增加了经验研究的难度。

微观经济理论认为,不同的资本量需要的劳动力不同。从宏观角度看,由于各个行业的特点不同,积累的资本存量不同,雇佣与培训劳动力的特点也不同。有些行业需要的是能够熟练操作机器的劳动工人而不是具有创新能力的高技能劳动者,而有些行业则需要具有创新能力的高技能劳动者为企业发展不断注入新鲜血液。这样便逐渐形成了高技能行业和低技能行业。因此,高技能劳动与低技能劳动的区分可以通过行业特点反映出来。当然,高技能行业并非全部是高技能劳动者,只是其高技能劳动者占比较大,因为每个行业都需要能够熟练操作机器的熟练工和尚未经过培训的非熟练工(本文将其统称为低技能劳动者),只有高技能劳动与低技能劳动相结合才能发挥效用。基于此,本文对行业进行划分,以间接分析不同技能劳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已有研究文献将各个行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四种类型(有些文献只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三种),根据该划分,武断地将技术密集型行业或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归为高技能行业都是不科学且不可取的。本文中,我们采用模糊聚类方法对高技能和低技能行业进行划分,该划分方法更加科学有效,从而为经验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考虑劳动异质性的理论模型与计量模型设定

假定劳动具有异质性,可以分为高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高技能劳动与资本结合,一部分产出直接进入市场,另一部分与低技能劳动结合,再加工后产出也进入市场。

高技能劳动与资本的有效结合对生产和技术效率的提高有很大的促进作

用，而且高技能工人对低技能工人还有指导作用，可以对其进行培训，使其由非熟练工人转化为熟练工人。这里的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同属于低技能劳动，不同的是熟练工人在单位时间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而高技能劳动则指具有创新能力的工人。借鉴 Bentolila 和 Saint-Paul（2003）的研究成果，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产出比存在确定的函数关系。假定考虑劳动异质性的生产函数为：

$$Y=H[K,G(L_1,L_2)] \tag{1}$$

其中，L_1 和 L_2 分别代表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G(L_1,L_2)$ 为劳动函数，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性质。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分别求导，则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partial Y/\partial L_i=(\partial H/\partial G)(\partial G/\partial L_i)=w_i/p;i=1,2 \tag{2}$$

因此，劳动收入份额为：

$$\begin{aligned}\alpha_L &= (w_1L_1+w_2L_2)/pY\\ &=[\sum_{i=1}^{2}L_i(\partial H/\partial G)(\partial G/\partial L_i)]/H(K,G)\\ &=G(\partial H/\partial G)/H(K,G)\end{aligned} \tag{3}$$

而资本产出比为 $k=K/Y$，这与 G/K 直接相关，对不同劳动技能进行细分后，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产出比也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我们在考虑不同技能劳动差异的同时，也要考虑劳动与资本的相互匹配问题。如果高技能劳动较多而没有相应的资本与之结合，那么产出不会达到最大化。假定高技能劳动需要相应的资本与之结合，而低技能劳动在高技能劳动的指导下进行生产，则 CES 生产函数可以设定为：

$$Y=[(AK+L_1)^{\varepsilon}+L_2^{\varepsilon}]^{1/\varepsilon},\varepsilon=(\sigma-1)/\sigma \tag{4}$$

其中，σ 为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替代弹性。根据(2)式，高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为：

$$w_1=[(AK+L_1)^{\varepsilon}+L_2^{\varepsilon}]^{(1/\varepsilon)-1}(AK+L_1)^{\varepsilon-1} \tag{5}$$

低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为：

$$w_2=[(AK+L_1)^{\varepsilon}+L_2^{\varepsilon}]^{(1/\varepsilon)-1}L_2^{\varepsilon-1} \tag{6}$$

将(5)式和(6)式代入(3)式，可得：

$$\alpha_L=[L_1(AK+L_1)^{\varepsilon-1}+L_2^{\varepsilon}]/[(AK+L_1)^{\varepsilon-1}+L_2^{\varepsilon}] \tag{7}$$

经整理，可得：

$$\alpha_L=1-Ak\omega[1+\omega^{\varepsilon/(\varepsilon-1)}]^{(1/\varepsilon)-1} \tag{8}$$

其中，$\omega=w_1/w_2$ 为高技能工人与低技能工人的工资比率。因此，劳动收入份额不仅与资本产出比有关，与不同技能工人的工资比率也有关。(8)式两边取对数，可得：

$$\ln(1-\alpha_L)=\ln A+\ln k+\ln\omega-\sigma\ln(1+\omega^{1-\sigma}) \tag{9}$$

其中，等式左边为资本收入份额，右边有两项包含工资比率，因而存在严重的

多重共线性,在设定回归方程时我们将后者剔除而只考虑工资比率对资本收入份额的影响。

此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技术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有很大关系,而且外商直接投资不仅直接作用于资本,还作用于劳动力,所以我们将 FDI 纳入回归方程。有研究指出,我国劳动力市场上普遍存在性别歧视,女性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低于男性劳动力,所以我们还选用了女性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这一指标。同时,考虑到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本文也将国有控股企业从业人员比重(state_labor)和销售收入比重(state_sale)纳入经验分析。这样,回归方程最终设定为:

$$\ln(1-\alpha_L)=c+\beta_1\ln k+\beta_2\ln\omega+\beta_3\ln FDI+\beta_4 female+\beta_5 state+\xi \qquad (10)$$

三、经验检验

(一)不同劳动技能行业的划分

我们首先需要对不同劳动技能行业进行划分。我们认为,如果在长期观测中行业的类别属性稳定不变,那么分类结果则具有可靠性和合理性。我们选取第二产业为分析对象,原因在于我国第一产业为农、林、牧、渔业,技能水平要求不高,从而不能体现对创新能力的要求;而第三产业为服务性行业,行业种类较多且分散,数据收集比较困难。

已有研究大多以受教育程度来反映劳动力技能的高低,但本文认为受教育程度反映的是劳动者被动接受教育的多少,劳动力技能的高低应体现在参加工作后其主动学习能力上,而主动学习能力最终又反映在社会价值创造和创新能力上。社会价值创造不仅包括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还包括创新性产品的产值和新产品销售收入等。根据要素价格均等化原则,随着国内行业间转移成本的降低,各行业的利润将趋于相等。因此,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并不能作为衡量社会价值创造的标准。与之相对应的,只有创新型企业才能获得超额利润,并推动社会整体的进步,所以本文将新产品作为划分不同劳动技能行业的标准之一。对于创新能力,我们将专利作为评价依据,因为如果某行业属于低技能行业,那么该行业中低技能工人较多,他们从事较繁琐的加工、装配、制造等工作而很难发明、申请专利,从而该行业的专利较少。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我们将涉及社会价值创造和创新能力的所有指标进行了归纳整理,得到 6 个指标,分别是各行业新产品项目数、新产品开放经费、新产品产值、新产品销售收入、专利申请数和有效发明专利数。其中,新产品项目数反映的是行业对高技能劳动的需求,新产品项目数越多,则对高技能劳动的需求越大,这样才能满足创新的需要;专利申请数反映的是高技能劳动在工作中产生的创新想法,有些创新能够改进生产效率,有些能够提高设备利用率,无论何种创新都只有高技能劳动力才具备相应素质;有效发明

专利数反映的是将创新想法付诸实践的能力,更加能够反映高技能劳动力的特点;新产品开发经费反映的则是企业或国家对行业的支持力度,因为只有高技能劳动的创新是不够的,还需要资金的配套支持,企业或国家的资金投入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高技能劳动的多寡和水平高低。上述 4 个指标反映的是创新能力。新产品产值是社会价值创造的最好体现,新产品销售收入则反映社会对新产品的认可程度,这两个指标是高技能劳动力创造社会价值的体现。

正如上文所述,每个行业均包含高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硬性划分必然会产生偏差,使分析结果失真。我们采用模糊 C 均值聚类方法对不同技能行业进行划分。与经典的分类方法不同,模糊 C 均值聚类属于一种软划分,通过优化目标函数得到每个样本点对所有类别的隶属程度,以达到对数据样本进行分类的目的。该方法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现实情况。具体来说,设 $X=\{X_1,X_2,\cdots,X_n\}\subset\Re^p$,$\Re^p$ 表示 p 维实数向量空间。令 u_{ik} 表示第 k 个样本点对第 i 类的隶属度,而且满足 $0\leqslant u_{ik}\leqslant 1$,$\sum_{i=1}^{c}u_{ik}=1$,$0<\sum_{k=1}^{n}u_{ik}<n$,$1\leqslant k\leqslant n$,$1\leqslant i\leqslant c$。记 v_i 为第 i 类的聚类中心,则 X 的一个模糊 C 均值聚类可以通过优化如下目标函数得到:

$$\min J(U,V)=\sum_{k=1}^{n}\sum_{i=1}^{c}(u_{ik})^m(d_{ik})^2 \tag{11}$$

其中,$d_{ik}=\|x_k-v_i\|$ 为第 k 个序列到第 i 类中心的欧氏距离。

由于统计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只收集了 2008—2010 年上述 6 个指标的数据,分别对每年第二产业中各行业进行了划分,数据来源于 2009—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在分析过程中,如果某个行业的类别发生了变动,则将其剔除。而我们并没有发现类别属性发生变动的行业,这进一步说明了模糊 C 均值聚类方法的稳定性与可行性。第二产业中各行业在 2008—2010 年对高技能行业的隶属度见表 1。

从表 1 可以看出,我国第二产业中大多数行业属于低技能行业,所包含的高技能劳动力较少,这些行业所需的大多是熟练劳动力,而不太需要具有创新性的人才。只有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以 95%以上的概率属于高技能行业,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则以 63.8%的概率属于高技能行业。从 2008—2010 年三年的聚类分析可以看出,第二产业中各行业属于高技能行业的概率几乎稳定不变,隶属度排名变化也不大,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始终保持较高的隶属水平,这说明采用模糊 C 均值聚类方法得到的结果是比较稳定的。

(二)变量设定及数据来源

计量模型(10)式中被解释变量为资本收入份额,我们可以通过劳动收入份额间接得到。我们收集了第二产业中各行业的工业总产值、产品销售收入、

表 1　第二产业各行业对高技能行业的隶属度

行业名称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均值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9800	0.9457	1.0000	0.9752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9664	0.9912	0.9516	0.9697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6178	0.5459	0.7503	0.6380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3137	0.2676	0.2763	0.2859
通用设备制造业	0.1228	0.0954	0.1016	0.1066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0.0650	0.0544	0.0665	0.0620
专用设备制造业	0.0385	0.0404	0.0526	0.0438
纺织业	0.0029	0.0093	0.0136	0.0086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0.0034	0.0033	0.0169	0.0079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0136	0.0036	0.0034	0.0069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0045	0.0046	0.0047	0.0046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0044	0.0045	0.0047	0.004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0.0045	0.0045	0.0046	0.0045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0.0042	0.0042	0.0045	0.0043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0038	0.0039	0.0036	0.0038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0.0031	0.0030	0.0048	0.0036
家具制造业	0.0034	0.0034	0.0037	0.0035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0.0034	0.0034	0.0030	0.0033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0005	0.0044	0.0046	0.0032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0029	0.0030	0.0032	0.0030
非金属矿采选业	0.0001	0.0043	0.0040	0.0028
医药制造业	0.0022	0.0029	0.0023	0.002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0043	0.0001	0.0015	0.0020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0.0019	0.0020	0.0010	0.0016
造纸及纸制品业	0.0001	0.0003	0.0045	0.0016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0.0015	0.0009	0.0001	0.0008
塑料制品业	0.0006	0.0007	0.0010	0.0008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0.0014	0.0002	0.0007	0.0008
食品制造业	0.0006	0.0007	0.0006	0.0006
饮料制造业	0.0005	0.0009	0.0001	0.0005
烟草制品业	0.0009	0.0000	0.0003	0.0004
化学纤维制造业	0.0000	0.0002	0.0003	0.0002
橡胶制品业	0.0001	0.0002	0.0001	0.0001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0.0000	0.0001	0.0002	0.0001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0000	0.0001	0.0001	0.0001
农副食品加工业	0.0000	0.0001	0.0000	0.0000
金属制品业	0.0001	0.0000	0.0000	0.0000

注:隶属度数据使用 Matlab7.1 编程计算得到。

产品销售成本和生产税净额等指标,数据来源于 1988—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根据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的核算方法,我们将工业总产值减去资本收入(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和生产税净额得到劳动收入,再除以工业总产值就可以得到劳动收入份额。

解释变量的设定及数据来源如下:(1)资本产出比。资本产出比为单位产

出的资本投入,是资本回报率的倒数。我们采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数据来源于各期《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一般来说,资本回报率越高,劳动收入份额越小,而资本产出比是资本回报率的倒数,所以我们预期估计系数为正。

(2)高低技能劳动的工资比率。由于第二产业各行业的隶属度在2008—2010年变化不大,采用其均值可以增强分析结果的稳定性。我们将各行业的劳动报酬分别乘以其隶属度均值,得到各行业高技能劳动的报酬总额。同时,我们引入年末就业平均人数指标,将其与隶属度均值相乘,近似得到各行业高技能劳动人数。进一步,我们用高技能劳动报酬总额除以高技能劳动总人数,即可得到高技能劳动的平均工资。同理,我们也可以得到低技能劳动的平均工资。两者的比值即为当年高低技能劳动的工资比率。数据来源于1988—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一般来说,高技能劳动与资本结合得更为紧密,高低技能劳动工资比率的提高有可能增加对资本的需求,所以我们预期估计系数为正。

(3)外商直接投资。该变量采用第二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其总产值的比值,数据来源于1988—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FDI可能对资本的作用较大也可能对劳动力的作用较大,所以我们无法确定其估计系数的正负。

(4)女性就业人员比重。该变量采用城镇工业行业女性就业人员年末数占就业人员年末总数的比重,数据来源于各期《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女性在全体就业人员中所占比重越大,劳动收入份额会越低,所以我们预期该变量的估计系数为正。

(5)国有化特征。我们选取了两个变量:其一为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年均人数占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年均人数的比重(state_labor);其二为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占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state_sale)。数据来源于各期《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利用1998—2005年37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估计得到国有比重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邵敏和黄玖立(2010)得到的结果为负,所以我们无法确定国有化指标估计系数的正负。

(三)计量分析结果

考虑到资本产出比可能与残差项相关,而且劳动收入份额也会影响高低技能劳动的工资比率而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本文采用系统GMM方法对计量模型(10)式进行估计,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高低技能劳动工资比率的提高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表明我国高技能劳动工资溢价的上升可能增加了对资本的需求,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负向影响。资本产出比的估计结果与大多数研究一致,其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表明FDI引入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邵敏和黄玖立(2010)基于中国工业行

业面板数据的分析得到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具有抑制作用,本文也证明了这一点。对于女性就业人员占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与预期不同,本文的估计系数为负,表明女性就业人员占比越高,劳动收入份额越大。其原因可能在于资本主要与男性劳动力相结合,而女性劳动者大多从事低技能的工作。国有化特征的估计系数均为负,表明国有化程度越高,劳动收入份额越大,这也证明了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的结论。

表2 模型估计结果(系统GMM)

变量	(1)	(2)	(3)	(4)	(5)
c	0.340***	0.613	0.690	0.346**	0.409**
	(0.000)	(0.376)	(0.413)	(0.016)	(0.028)
lnk	0.312**	0.336**	0.359*	0.317*	0.347**
	(0.016)	(0.027)	(0.080)	(0.053)	(0.031)
lnω	0.161**	0.160*	0.156*	0.160*	0.125*
	(0.041)	(0.054)	(0.088)	(0.064)	(0.060)
lnFDI	1.120**	1.173**	1.245*	1.136*	1.233**
	(0.022)	(0.032)	(0.074)	(0.065)	(0.028)
female		−0.730*	−0.870*		
		(0.086)	(0.073)		
state_labor			−0.036**	−0.009*	
			(0.044)	(0.054)	
state_sale					−0.099**
					(0.049)
Adj. R^2	0.962	0.959	0.953	0.958	0.959
F统计值	103.2429***	70.383***	49.572***	68.86***	70.81***
DW统计值	1.9885	2.1597	2.2083	1.9958	2.0904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创新性地采用模糊聚类方法对不同技能行业进行了划分,计算了高低技能劳动的工资比率,并进一步实证分析了高低技能劳动的工资比率、FDI等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于高技能劳动一般与资本结合得更为紧密,高低技能劳动工资比率的提高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FDI引入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也具有负向影响。本文主要得到以下启示:

(1)为了抑制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一方面,应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要弱化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绩效竞争,扩大贸易开放度,让更多的潜在劳动力进入就业市场,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2)本文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从而会使资本所有者所得越来越多而劳动者收入越来越少。社会财富在不断增加,但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社会贫富差距会不断扩大。为此,必须建立健全利益共享机制,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

主要参考文献：

[1]白重恩，钱震杰. 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J]. 经济研究，2009，(3)：27－41.

[2]罗长远. 卡尔多"特征事实"的再思考——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分析[J]. 世界经济，2008，(11)：86－96.

[3]罗长远，张军. 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占比：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2009，(4)：65－79.

[4]邵敏，黄玖立. 外资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J]. 经济学(季刊)，2010，(4)：1189－1210.

[5]周明海，肖文，姚先国. 企业异质性、所有制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J]. 管理世界，2010，(10)：24－33.

[6]Acemoglu D. Labor-and capital-augmenting technical change[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03，1(1)：1－37.

[7]Bentolila S，Saint-Paul G. Explaining movements in the labor share[J]. The B. E.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2003，Contributions. 3(1)：Paper 9.

[8]Guscina A.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on labor's share in national income[R]. IMF Working Paper No. 294，2006.

[9]Jayadev A. Capital account openness and the labor share of income[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07，31(3)：423－443.

FDI，Labor Heterogeneity and Labor Share in China

WANG Shu-hong

(*School of Economics*，*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The division of labor with different skills is always an important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issue in labor market. This paper employs fuzzy clustering technique to estimate the high labor skill of industries in the secondary industry and measures the wage ratio of industries requiring high-skilled labor to ones requiring low-skilled labor. Furthermore，it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factors such as the wage ratio of industries requiring high-skilled labor to ones requiring low-skilled labor and FDI on labor share in China.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firstly，owing to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with high skill and capital，the increase in the wage ratio of industries requiring high-skilled labor to ones requiring low-skilled labor inhibits the rise in labor share；secondly，the introduction of FDI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labor share in China.

Key words：labor heterogeneity；FDI；labor share；fuzzy C-means clustering technique

（责任编辑　康　健）